

孔丘反动教育思想 批判

湖北人民出版社

孔丘反动教育思想批判

•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7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11106·108 定价：0.22元

毛主席语录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目 录

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	唐晓文	(1)
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2)
论孔丘教育思想的阶级性	江 铭	(23)
孔丘——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教育家		
.....	陕西师范大学 刘文义	(35)
孔丘是用教育进行复辟的祖师爷		
.....	北京师范学院 刘国盈 李允经 郑伯琛 饶杰腾	(46)
孔丘的教育思想与“克己复礼”	唐晓文	(56)
孔丘聚徒讲学与“克己复礼”		
.....	中央民族学院大批判组	(67)
批判孔丘反动的艺术教育思想	易 达	(75)
儒家的“教子读经”是什么货色		
.....	共青团北京市委大批判组	(83)
历史的见证		
——从旧清华看尊孔崇洋的反动本质	秦 华	(94)
儒家反动教育思想批注		
.....	上海市第六十一中学 七六届(1)班理论学习小组	(105)

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

唐 晓 文

历代的反动统治者，把孔子捧为“万世师表”。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后，资产阶级文人学者适应反动统治者的需要，又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反动逆流。他们大肆吹嘘孔子所主张的“有教无类”，是什么不分阶级招收学生，把他打扮成“全民教育家”。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就鼓吹孔子主张“教育可以打破一切阶级与界限”，“摧破一切阶级的畛域”，孔子的“有教无类”是“很震动社会的一个革命学说”，竭力把孔子打扮成“全民教育家”，替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奴役和毒害中国人民效劳。托派分子李季，则叫嚣什么孔子是“新兴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地主阶级的代表，富于朝气”，用吹捧孔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的办法，为其反共反人民的肮脏勾当服务。混进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一贯尊孔，解放以后，他们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鼓吹“有教无类”的谬论，造成极恶劣的影响。现在我们开展对孔子思想批判的时候，竟还有人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应当肯定。

孔子果真是什么“全民教育家”吗？

孔子的“有教无类”到底是什么货色？

孔子的教育思想应当肯定吗？

我们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来观察这些问题。

孔子施行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孔子生于春秋晚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代。孔子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梦想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他极端仇视当时的社会变革，哀叹“天下无道”、“礼坏乐崩”。他以复辟西周奴隶制度为己任，提出一套以“仁”为中心的反动政治、伦理思想，叫嚷要复兴已被灭亡了的奴隶主贵族国家，让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延续下去，把已经倒台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起来当权，这样，天下的奴隶就会服服帖帖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他东奔西跑，周游列国，到处活动，一心想做官，以实现其“复礼”（复兴西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的美梦。他还办私塾，招收学生，想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够恪守“周礼”的“仁人”、“志士”、“君子”、“贤人”，靠他们“学而优则仕”，即读书做官，以复辟西周奴隶制度。可见，孔子的教育活动是为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政治服务的。这个反动的政治目的决定了孔子的教育路线，贯串于他的全部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托派分子李季胡说孔子是新兴地主阶级代表，完全歪曲和颠倒了历史。

为了实现这个反动政治目的，孔子要教什么人呢？能够象有人所说的那样不分阶级招收学生吗？

奴隶社会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是奴隶和奴隶主阶级。要看孔子是否不分阶级招收学生，首先就得看他是否招收那个社会最广大的群众——奴隶。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主根本不

把奴隶当人看，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可以任意迫害、买卖和杀戮。考古发掘和古代文献都证明，中国古代的奴隶主贵族成百成千地屠杀奴隶来祭祖和殉葬。他们怎么会让奴隶受什么教育呢？事实上，孔子自己也露骨地把奴隶排除在他的教育对象之外。他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把人分成几等：“生而知之”是上等，“学而知之”是次等，“困而学之”又其次；至于奴隶（“民”），那是“困而不学”的下等（《论语·季氏》）。不仅如此，他还明明白白地主张：“上知”和“下愚”是天生不能改变的（《论语·阳货》），在他看来，天生“下愚”的奴隶是根本不堪造就的。因此，他恶狠狠地叫嚷：奴隶只配叫他们老老实实干活，决不该让他们知道什么道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看，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敌视奴隶的反动立场是何等鲜明！他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不能不敌视奴隶，不能不主张这种反动的愚民政策。

孔子自我标榜：只要送我一束干肉，我没有不进行教育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这句话恰恰揭穿了所谓孔子不分阶级招收学生的说法，完全是虚伪的。试问：在一匹马加一束丝就可以换五个奴隶（“曾鼎”铭文）的社会里，奴隶是可以被买卖的货物，根本没有人身自由，怎能拿得出一束干肉来缴学费呢？当然，孔子学生很多，号称“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其中也有一些所谓“穷学生”。例如，有“穷居陋巷”的颜渊，“与父耘瓜，其母亲织”的曾参等等。这也被某些人作为孔子不分阶级招收学生的证据。其实，颜渊祖先十四世仕鲁，都是卿大夫，到他父亲才衰落的。曾参则是被鲁国灭亡了的鄫国太子巫的后裔。可见，这些人都是破落奴隶主贵族出身。他们的“穷”，是相对于奴隶主阶

级中的贵族来说的，他们显然还是奴隶主阶级的一分子。企图用此证明孔子招收学生不分阶级，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孔子的学生中还有一些所谓出身“卑贱”的人。例如冉雍的父亲是“贱人”，子贡“货殖”等等。也有人把这当作孔子招收学生不分阶级的理由。其实，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在奴隶主贵族看来，只有当官有势的人才是高贵的，其余从事农、工、商业的人，都是卑贱的。孔子曾经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但是，孔子并不是奴隶，而是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这里所说的“贱”，就是“不见用”，没有当官的意思，而“鄙事”则是指技艺。所以，冉雍的父亲那个“贱人”，也不过是一个没有官职的人罢了。至于子贡，从《史记》等书上说他是卫国的商人，“结驷连骑，家累千金”等情况看，显然是一个商业奴隶主。无论如何，这些所谓出身“卑贱”的人，不可能是奴隶，因为在古代奴隶制社会，奴隶根本没有做“人”的资格，他们往往被称为“民”、“氓”、“氓”、“萌”或“徒”等等，而不被称为“人”。所以，所谓“不择贵贱”云云，最多不过是在奴隶以外的某些阶级、阶层中不分有无官职的人罢了。企图以此证明孔子不分阶级招收学生，也是徒劳的。

从孔子教他的学生学什么，也可以看出他所施行的决不是什么“全民教育”。为了培养学生为奴隶主贵族服务，孔子规定学生们只能学奴隶主贵族那套礼、乐、诗、书等课程，其中尤其注重“周礼”。他以奴隶制典章制度的继承者自命，即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他认为，学礼是根本，只有先受奴隶制典章制度的系统教育，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至于生产劳动之类的事，那是根本不必学，也不屑于学

的。一次，他的学生樊须(迟)请教如何耕田、种菜，他竟气呼呼地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樊须走后，他还破口大骂：“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象这样一个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敌视劳动人民的反动家伙，竟然会去招收奴隶当学生，岂非咄咄怪事！“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地主资产阶级把孔子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既不会做工，又不懂耕田种菜，也不明白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他那一套“学问”不过是秕糠而已，劳动人民是不买账的。在劳动人民的眼里，孔子不过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蠢家伙、寄生虫，是根本不配当先生的。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新民主主义论》)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是为该时代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古今中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全民的教育。无论从那方面看，孔子的教育活动都是为复辟西周奴隶制度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孔子本人是个地地道道奴隶主贵族的忠实奴才。所谓“全民教育家”不过是一些人给孔子披上的一张画皮。

“有教无类”是什么货色？

有人说，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就是要“打破阶级界限”教育学生。这是极其荒谬的。

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沿用氏族宗法制度，等级极其森严。不仅各个阶级、阶层界限分明，士农工商，不可使杂处，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管子·小匡》）；而且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等等，也只能世袭，不得僭越。孔子是“周礼”的忠实卫道士，他对于春秋时代奴隶制等级制度的崩溃，即由于“犯上作乱”所造成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痛心疾首，大声疾呼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怎么可能去“打破阶级界限”呢？很明显，所谓“有教无类”，根本不是讲要“打破阶级界限”教育学生，而是另有所指。

《论语》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论中，“人”和“民”这两个概念，一般说来是有区别的。“人”是泛指奴隶以外的阶级、阶层，包括奴隶主贵族、一般奴隶主、新兴地主阶级和个体劳动者等等；而“民”则是专指奴隶。与此相适应，“诲”和“教”这两个概念，也是有区别的。《论语》记载孔子谈到“诲”的共有五处：

（一）由！诲女（你）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

（四）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

（五）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宪问》）

可以看出：孔子所说的“诲”是和“人”相联系的，“诲”的

对象是“人”。受“诲”是自愿的，不是强制的，要有一个条件，就是缴学费。因此，孔子说的“诲”，相当于后来“教育”的意思，是对奴隶以外的阶级、阶层的人进行教育。

《论语》中谈到“教”的共有七处：

（一）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

（二）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

（三）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

（四）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五）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曰》）

（六）有教无类。（《卫灵公》）

（七）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其中前六处是孔子自己说的话，第七处是孔门后学对孔子所教课程的概括，所以同孔子的用语有所不同。我们从前五处孔子自己说的话中可以看出：“教”是与“民”相联系的，就是说，它的对象是“民”。它的内容则是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教”者是“人”，而受“教”者是“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受“教”是无条件的、强制的，不是自愿的。孔子所说的“教”，指的是对奴隶的教练，同他所说的“诲”，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有教无类”明明说的是“教”，是对奴隶进行强制的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把它和孔子所说的“诲”，即对奴隶以外的阶级、阶层进行教育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这句话中所说的“有”，古时与“囿”、“域”通用，指地域，“类”是指族类，即

民族的区别，不是指什么“阶级界限”或“家庭出身”。

因此，所谓“有教无类”，孔子的原意不过是：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对奴隶进行强制教练罢了，根本不是什么“打破阶级界限”教育学生的意思。春秋时代，由于奴隶不断起义，兼并战争频繁，奴隶制的氏族宗法制度日趋崩溃，不同姓氏的贵族互相混杂，从属于不同姓氏的奴隶也混杂起来了。统治者再也不能象西周那样按氏族，而必须按地域划分进行统治了。与此相适应，对奴隶的强制教练，也不得不按地域进行了。在一个诸侯国中存在着不同姓氏的大夫，他们有“民”有兵，对“公室”是很大的威胁。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主张按地域编制，不分氏族，对奴隶进行强制教练，一方面，是要削弱“私门”主要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势，保护“公室”即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奴隶的控制，防止他们造反。怎么能把“有教无类”说成是什么“打破阶级界限”，“普及了教育”呢？

事实上，先秦诸子对孔子的“有教无类”并未作任何解释。只是从东汉马融开始，才解释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论语古注集笺》卷十五）南北朝的皇侃又把不分贵贱进行教育的意思塞进去，说：“人乃有贵贱，同宜资教”（《论语集解义疏》卷八）。从此以后，以讹传讹，历代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就把“有教无类”解释为不分贵贱，不问贫富，以适应自己的政治需要。

总而言之，孔子讲的“有教无类”同他所从事的教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根本不能成为“打破阶级界限”之类论调的根据。

为什么要把孔子打扮成“全民教育家”？

列宁曾经说过：“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这正是对百分之九十九是受教会势力和私有制等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事情正是这样。资产阶级的教育实际上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放在第一位，他们的学校就是替资产阶级培养人才，他们所谓“普遍义务教育”，则是用来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奴隶。资产阶级从来都没有想使教育成为什么不分阶级的“全民教育”。但是，为了欺骗群众，他们胆怯地隐瞒了这一点，反而高唱什么“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的资产阶级同西方资产阶级一样伪善，不同的只是，他们所唱的教育超阶级的调头多少带一点中国的特色罢了。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具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性质。那时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它高举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旗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反对尊孔读经，使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威信扫地，在历史上起了伟大的作用。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右翼，曾经参加了这个运动。但是，五四运动以后，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站到反动方面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就急急忙忙赶到山东曲阜孔庙焚香顶礼。后来他又把孔子的那套封建糟粕作为封建、买办、法西斯教育的重要内容。资产阶级文人学者适应蒋家王朝的需要，也把西方资产阶级关于教育超阶级的那一套货色搬运过来，贴上“孔家店”的商标，

掀起了一股尊孔的反动逆流。什么孔子“大招学生，不问身家……一律教以各种功课，教读各种名贵典籍。此实一大解放也。”诸如此类的论调，喧嚣一时。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跟在资产阶级文人学者后面摇旗呐喊，起劲地叫嚷孔子实行“有教无类”，“有其独特的成绩”，“在中国文化史上应当大书特书”。这样，孔子就被打扮成一个“全民教育家”。事实俱在，这个“全民教育家”是适应国民党反动派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需要塑造出来的。鲁迅说得好：“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一向是“孔孟之道”的狂热鼓吹者。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又继承了尊孔的反动逆流。一九六二年，当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十分猖狂的时候，他们公然导演了一幕“孔庙朝圣”的丑剧，组织了所谓“孔子讨论会”，妄图借孔子的亡灵来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于是乎什么孔子实行“有教无类”，“打破阶级界限”教育学生，“普及了教育”等等奇谈怪论，不胫而走。当这股反动逆流遭到毛主席和革命群众迎头痛击之后，刘少奇在文教界的代理人陆定一，还拍着胸脯打保票，说什么：“‘有教无类’对不对？我说对，还是‘有教无类’！”当林彪反党集团躲在阴暗角落里策划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时候，居然也把孔子的牌位供奉起来，用“不成功便成仁”的口号表示其反革命的决心。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的事实表明，尊孔和反孔的斗争是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刘少奇、林彪之流所以热衷于把孔子吹捧为“全民教育家”，宣扬“有教无类”的滥调，就是要为其修正主

义的教育路线制造理论根据，妄图抹煞无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性，把我们的学校变成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场所，以便使地主资产阶级继续垄断文化教育，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然而，孔子的亡灵既不能保护中国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免于灭亡，也救不了刘少奇、林彪的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把他们连同他们所供奉的孔子牌位一起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当前，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正在生气勃勃地深入开展，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旧教育制度土崩瓦解，无产阶级的新教育制度正在兴起。但是，在新事物的成长过程中必然要遇到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势力的顽强反抗。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总是力图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马克思说过：“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学校招生标准和办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试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坚持资产阶级教育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我们必须贯彻党的十大精神，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肃清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原载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十二期转载时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 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孔子是春秋末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他一生都在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度。他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办教育。

历代反动统治者把孔子吹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林彪一伙甚至公然叫嚷：要“大书特书”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划时代的功绩”。

孔子办教育的历史本来面目究竟怎样？我们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列主义观点加以剖析。这对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很有必要的。

为奴隶主服务的“私学”

过去，有的人因孔子办私学，吹捧他是我国历史上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把学问从贵族手里拿到平民手里的一位大师。从那时候起，中国的教育已经掌握到平民手里了”。把孔子说成好象是一个“进步的大教育家”。这是对历史的歪曲。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时期。当时，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

革。与此相适应，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专为奴隶主贵族官僚子弟开设的官办教育——“官学”，妨碍了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文化和从事政治活动。同时，社会上主张变革的新思潮也波及“官学”内部，引起了奴隶主当权派的恐惧，有的人提出了“可以无学，无学不害”的主张（《左传》昭公十八年），甚至有“毁乡校”的议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的不断冲击下，“官学”就再也难于维持下去了。

随着“官学”的日趋衰落，私家收徒讲学日渐兴起。与孔子同时期办私学的，有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等。少正卯宣讲的是革新思想，吸引了大批学生，甚至孔子的弟子也离开孔子而“归少正卯”，以致“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王充：《论衡·讲瑞》）。

这些史实说明，官学并非孔子“打破”，而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教育“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有鲜明的阶级性。孔子办学和少正卯办学，虽同为私学，却属于不同的阶级和政治路线，有着不同的目的和内容。因此，离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离开教育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用“官办”还是“私办”来评价办学是反动还是进步，这是十分荒唐的。

孔子所办的私学，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在腐朽的官学制度已经不能抵挡新思潮的进攻，私学兴起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以奴隶主阶级卫道士的姿态，也用办私学的方式，把奴隶主阶级官学的反动使命接了过来。他收罗